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三

史记

研究资料萃编

上册

张新科 高益荣 高一农 主编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三

史记

研究资料萃编

上册

张新科 高益荣 高一农 主编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期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复次，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此期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藉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

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本方向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本研究方向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人民的喜爱，已经被选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本方向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

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 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汉唐文学研究丛书》、《长安学术丛书》、《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前 言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从汉代就已起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我们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这两千多年的研究史略作回顾。

司马迁《史记》完成之日，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确立之时，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荡然无存，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在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叛经离道之作，是“谤书”。同时，史学在两汉时期还没有它应有的独立地位，它被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列入《春秋》类中。因此，《史记》的传播遇到很大的阻力，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得到广泛流传。魏晋以后，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冲击着儒家的传统思想，人们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思想认识有了新的特色。与此同时，学术上的一大变化就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身价得到相应的提高。就传播而言，司马迁的外孙杨惲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①。后来，《史记》在流传中有所残缺，褚少孙又补续了某些篇章，使《史记》成为完璧。桓宽《盐铁论》、刘向《别录》已开始节引或直接引用《史记》原文，高诱用《史记》注释《吕氏春秋》《战国策》，他们对《史记》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史记》的传播，促进了史学的发展，班氏父子的《汉书》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撰史风气的形成，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而且，《史记》在唐以前也传到了国外^②。本时期譙周《古史考》、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等对《史记》事实的考证，揭开了古史考辨的序幕，具有重要意义。从研究方面看，本时期属于起步阶段，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发表过许多意见，他们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肯定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从对后代的影响来说，有三点值得我们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李延寿《北史·高丽传》载高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可见唐以前《史记》已传到国外。

注意：其一是扬雄、应劭、刘勰等人指出司马迁有“爱奇”倾向，甚至把“奇”与“义”、“奇”与“经”对等看待，后来许多学者继承了这种观点，只可惜他们没有深究“奇”的真正涵义。其二是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评价：“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① 他们的评价对后代影响很大，以至于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史记》研究的一条主线^②，但也引起了历代学者的争议。其三是班马优劣之说，“王充著书，即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③，这在后代也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甚至成为一门学问。总之，本时期是《史记》研究的开创期，给后代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时期，由于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在史学史上备受尊崇，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八部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全部采用纪传体。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对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④ 唐代史学家对《史记》非常崇敬，且注意发扬光大司马迁的思想，如杜佑发展了《史记》八书的传统，著《通典》一书，从古今典章制度沿革的利弊上去寻求解决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唐代对于《史记》的评论和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注释《史记》，如顾柳言《史记音解》三十卷，许子儒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史记地名》二十卷，王元感注《史记》一百三十卷，李镇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陈伯宣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徐坚注《史记》一百三十卷，裴安时《史记纂训》二十卷等（这些注本都已散佚），而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的形成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从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到注人、注事、注天文历法、山川草木、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参鹿诤慧《试论封建社会史记研究的主线》一文，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③ 刘知几《史通·鉴识》。

④ 刘知几《史通·二体》。

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等，无所不备，对后人阅读理解《史记》帮助很大。其中虽有错误，但仍不失为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唐人研究《史记》的第二个成就是评论《史记》体例，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几、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就《史记》五体而言，唐人一般对书以肯定为主，对表的认识还不明确，如刘知几一方面有废表之论，一方面又肯定其长处。对于本纪，司马贞主张在《五帝本纪》前补写《三皇本纪》，司马贞、刘知几还认为《秦本纪》《项羽本纪》不当列入本纪，这是他们对司马迁深刻思想不理解所致。对于世家，司马贞、刘知几认为它有当立不立、不当立而立等升降失序之病，如《陈涉世家》《孔子世家》等。对于列传，司马贞、刘知几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总之，唐人对《史记》五体的评论，有不少偏激之辞，但总体上还是持肯定态度。唐代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开发，这是唐代《史记》研究的第三个成就。韩愈以“雄深雅健”赞誉《史记》的语言风格，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风貌，都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金时代《史记》研究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宋代大量刊刻印行《史记》，为人们研读《史记》提供了方便，从名师硕儒到一般的文人士子，普遍喜好《史记》，百读不厌。宋人也注重学习《史记》的作文之法，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人都是宋代古文大家，他们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提倡学习《史记》，并身体力行，取得了可喜成果，《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宋代开评论《史记》之风气，或论史事，或评人物，或谈文章，有褒有贬，不宗一派。大部分学者对《史记》持肯定态度。郑樵对《史记》甚为推崇，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指出司马迁的重大贡献在于“通”，这是第一个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的人。宋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课题：其一，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①，开拓了《史记》研究新领域。其二，苏辙、马存认为，司马迁壮游天下的阅历对他性情的陶冶、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知人论世的剀切之言。本时期的评论，把班马优劣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

^① 《苏老泉先生全集》卷九。

等人都发表过评论，乃至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娄机《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本时期王若虚撰《史记辨惑》十一卷，对《史记》在采摭、立论、体例、文字等方面的失误，广为疑惑，并略作辨证。但多偏激之辞。

元代除了在评论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外，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进行广泛的宣传。元代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时期，许多杂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180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田单复齐》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反过来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明代前期，由于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因而学术空疏，《史记》研究也未形成大的气候。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已经出现，商业日趋繁荣，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的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在思想文化界引起震动，《史记》研究随之而兴盛。其特点是：

第一，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出现，《史记》的声价随之提高。如前后七子，“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①“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②《史记》成为他们效法、学习的榜样。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等人，也对《史记》推崇备至，并且都评点或评钞过《史记》。

第二，评论《史记》成为风气。宋代开了评论《史记》的风气，到明代，这种风气日益兴盛。或评历史人物，或评历史事实，或评编纂思想与体例，或评文学手法。其中从文学角度评论《史记》取得的成就最大，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③。如李贽说：“《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窥也软。”^④ 王维桢评《史记》笔法说：“或由本以

① 《续藏书·何景明传》。

② 《明史·文苑传序》。

③ 详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藏书》卷四十。

之末，或操末以续颠，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从旁入。意到笔随，思余语止。”^①屠隆评《史记》艺术风格：“贾马之文，疏朗跌宕，雄健隽古，其苍雅也如公孤大臣，庞眉华美，峨冠大带，鹄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修然清枯也；其葩艳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绣服，华轩翠羽，光彩照人，而非若娇姬艳唱之翩翩轻妙也。”^②明代学者中，像何孟春、董份、王鏊、凌约言、陈沂、王维桢等人都评钞过《史记》，唐宋派代表人物及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人都是评点《史记》的大家。

第三，由于明代小说的繁荣，人们对《史记》的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李开先、天都外臣、李贽、冯梦龙、金圣叹等人，都发表过精彩的见解。其中金圣叹尤为突出，他用读《水浒传》的方法读《史记》，又用读《史记》的方法读《水浒传》，令人耳目一新。如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③金圣叹有时还把《史记》与《西厢记》进行比较，寻找它们的共同点，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四，明代对《史记》历史事实的考辨与纠谬也有一定成就，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骥《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在考辨方面颇有新意。一些笔记著作，如王鏊《震泽长语》、郑瑗《井观琐言》、杨慎《丹铅杂录》、焦竑《焦氏笔乘》等，对《史记》的事实虚实也有一定纠谬。

明代《史记》研究除上述成就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其一，以凌稚隆《史记评林》为代表的辑评工作，搜集整理各家评论，汇为一编，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被人称为“渡海之筏”；其二，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代刻印《史记》达200多种，对于推动《史记》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据统计，研究《史记》并有文章著作的学

① 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

② 《由拳集》卷二十三。

③ 《读第五才子书法》。

者达 300 多人，著作如储欣《史记选》、吴见思《史记论文》、王治暉《史记榷参》、方苞《史记注补正》、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汪越《读史记十表》、汤诒《史记半解》、杭世骏《史记考证》、牛运震《史记评注》、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史记商榷》、邵泰衢《史记疑问》、赵翼《史记札记》、钱大昕《史记考异》、邱逢年《史记阐要》、梁玉绳《史记志疑》、林伯桐《史记蠡测》、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尚镛《史记辨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程余庆《史记集说》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他如顾炎武《日知录》、李晚芳《读史管见》、刘大槐《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刘熙载《艺概》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清代《史记》研究成就最大的在于考证方面。由于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文人学者只好埋头于考证古籍，以免遭祸。清人考证《史记》，重事实，重证据。或以《史记》纪传对勘，或以前后文互比，或用先秦经传相印证，或以《汉书》证《史记》，在比较中明异同，见正误。又注意搜罗各种杂史、稗官野乘、地理方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互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清人考证，大至重要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都不放过。如梁玉绳《史记志疑》，对《史记》史事和文字的考证极为精审，钱大昕为此书作序，称它“足为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矣。”张文虎的著作，就《史记》一些字的衍、倒、错、缺等用十多种版本进行对勘，为以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奠定了基础。

除考据外，清人的评论也值得肯定，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① 清人评论的问题十分广泛，有些是传统课题，有些是新出课题，许多见解十分精辟。如《史记》十表，唐人刘知几曾有废表之论，从宋代开始人们对史表的认识有了提高，到了清代，出现了许多论表著作，对《史记》各表的主旨、功用、书法、详略等方面进行分析阐发。吴见思说：“诸表画而为图，纵横

^① 《廿二史札记》卷一。

明晰，于列国楚汉时事，纷然之际，开卷无不了然。此法创自史公，是千古绝奇文字。”^① 邱逢年在《史记阐要》中说：“史公创为表式，尺幅一经一纬，昭穆之次，时事先后之序，强弱之势，君臣上下得失之林，一一分明，乃本纪、世家、列传之总会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十表“与纪传相为出入”，等等，都是有价值的评论。又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前代对此评说不一，清人对此却十分重视，牛运震说：“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义远神，诚为千古绝笔。”^② 牛氏的评论，代表了清人对“太史公曰”的共同看法。

清人对《史记》文学成就也进行了多方面评述，尤其是桐城派的评论，把《史记》艺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刘大櫆用“奇”、“高”、“远”、“大”、“疏”、“变”来概括《史记》文章的特点。林纾是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从声调入手，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的分析，对司马迁委曲逼真地描绘人情世态的分析，对各篇结尾艺术的分析，都颇有新意。除桐城派外，许多学者对司马迁变化多端的叙事、高超的写人艺术等进行评论，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③ 汤诒说：“《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烟云缭绕处，几于勺水不漏，而寄托遥深，迷离变幻，使人莫可端倪。一片惨淡经营之意匠，皆藏于浑浑沦沦浩浩落落之中，所以为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阔疏也。”^④ 李晚芳《史记管见》、吴见思《史记论文》等，都在评论《史记》艺术美方面作出了成就。

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是《史记》研究的承前启后时期，在考证和评论方面都有新收获。崔适《史记探源》、魏元旷《史记达旨》、李笠《史记订补》、杨启高《史记通论》、刘咸忻《太史公书知意》、齐树楷《史记意》、李景星《史记评议》、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靳德峻《史记释例》、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和《史汉研究》、朱东润《史记考索》、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研究专著。本时期的学者注意用新的思想

① 《史记论文·三代世表》。

② 《史记评注》卷一。

③ 《艺概·文概》。

④ 《史记半解·杂述》。

观念对《史记》进行评论,如程金造《司马迁崇尚道家说》和张鹏一《史记本于公羊考》,从新的角度考察了司马迁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齐树楷《史记意》用“势”的思想来阐发《史记》的立意和司马迁的进步思想。潘吟阁《史记货殖列传新论》则是以近代资产阶级观点系统诠释《货殖列传》的第一篇著作。一些传统课题又有新进展,如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对司马迁生卒年作出了严密的考证,使他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第一位系统考证司马迁生卒年的学者,他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这一观点受到大多数学者的信服。另外如顾颉刚、李长之对司马谈作史的探究,余嘉锡对太史公书亡篇的考释,李景星对《史记》文章的评议,郑鹤声对汉史优劣问题研究的总结,李长之对司马迁人格与风格的评述,鲁实先对《史记会注考证》的驳议,朱东润对《史记》断限、伪窜、史实抵牾诸问题的考索,靳德峻对《史记》体例的分析,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成就。章炳麟、李大钊、鲁迅、茅盾、刘师培、范文澜、吕思勉、罗根泽、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也在各自的著作中程度不同地论述了《史记》。本时期的成就为新中国建国后《史记》研究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建国后,是《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时期。本时期的《史记》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广大文史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史记》研究有了科学的、正确的方向。20世纪50年代为初见成效期,首先在普及宣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华书局出版了新的《史记》标点本,许多学者选编《史记》,介绍司马迁,并且翻译为少数民族文字。学术研究也向深入方向发展,郭沫若对司马迁行年的研究,卢南乔、齐思和对《史记》编纂方法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探索,陈直对《史记》名称及其早期传播情况的研究,季镇淮、冯其庸、殷孟伦等对《史记》文学成就的研究,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贺次君对《史记》版本的研究,等等,都是新成果的代表者。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美化、拔高司马迁的不良倾向。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为逐步深入期,白寿彝、陈可青、王启兴等人对司马迁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可喜成绩。许多学者还对游侠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使研究有了一定深度。后半期由于“十年浩劫”,《史记》研究也处于停顿状态。1977年以后,为全面丰收期,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逐步深入,研究队伍日益壮大^①。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

① 详参《史记研究史略》第七章《建国以来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

从史学到地理,从文学到美学,从伦理到哲学,从天文到医学,从军事到人才,学术界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专著如:陈直《史记新证》,白寿彝《史记新论》,陆永品《司马迁研究》,徐朔方《史汉论稿》,程金造《史记管窥》,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张大可《史记研究》《司马迁评传》,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肖黎《司马迁评传》,吴汝煜《史记论稿》,周经《司马迁、史记与档案》,何世华《史记美学论》,黄新亚《司马迁评传》,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韩兆琦等《史记通论》,陈桐生《史记与中国史官文化》,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等。另外如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杨燕起、俞樟华《史记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俞樟华《史记新探》等,也都有一定影响。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电脑等现代化的工具也被运用到《史记》研究上来了,这是前代无法比拟的,李波、李晓光主编的《史记索引》就是一例。赵光勇、许允贤编导的电视片《司马迁故里行》以及大型电视片《司马迁万里行》等运用影视手段宣传司马迁,也颇引人注目。《史记》的选注本、全注本、选译本、全译本都相继问世。另外,随着形势的发展,将在西安建造大型的“史记城”,使《史记》更加深入人心^①。

在司马迁故乡韩城市,除了保护好太史祠等重要文物古迹外,群众还注意宣传司马迁、研究司马迁。他们出版了许多具有乡土气息的研究著作,如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千秋太史公》,徐谦夫《司马迁的传说》,冯庄、张天恩主编《司马迁研究》,张天恩、冯光波《历代咏司马迁诗选》,党丕经《司马迁与韩城民俗》,李国维、张胜发《司马迁祠碑石录》,高巨成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些成果,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一定反响。

总之,新中国建国后的《史记》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史记》研究正向纵深方向发展。

台湾的《史记》研究,是我国《史记》研究的一部分。60多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发表400多篇论文,出版40多部专著。马持盈、劳干、屈万里、杨家骆、徐文珊、陈飞龙等在《史记》的普及方面作出了贡献。王叔岷、施之勉、钱穆等对《史记》文字、史实、地名的校

^① 见《团结报》1994年6月4日。

勘考订，赖明德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研究，徐复观对《史记》所蕴蓄的史学精神的发掘以及史汉比较研究，阮芝生对《史记》名篇精神的深入探索，等等，都能启人耳目，值得重视。

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史记》在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曾将《史记》许多篇译成俄文。法国汉学家汉晔曾将《史记》一部分译成法文。韩国也出版了李成珪先生编译的《史记》抄译本。此外，英、德、美汉学家都翻译过《史记》许多篇。《史记》在日本影响最大，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已形成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研究队伍，仅近现代而言，颇有影响的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芦洲、池田英雄、伊藤德男、今鹰真、藤田胜久等 100 多人，研究专著和译著有 600 多种，单篇论文不胜枚举。《史记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等著作，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日本学者在某些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我们国内的研究。当然，国外的《史记》研究还很不平衡，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国外研究成果被介绍进来的也不多。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强《史记》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也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以上我们简要叙述了两千年来的《史记》研究的基本面貌。就国内情况来说，以 1949 年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大期。前期的研究，问题集中在六个方面：一、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学术渊源；二、《史记》取材、编纂体例、流传、影响；三、《史记》各篇内容和艺术成就；四、《史记》的史料；五、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章、地理沿革；六、《史记》与《汉书》比较。这些研究，给后人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史记》研究还停留在“史科学”的水平上。1949 年以后，《史记》研究才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已初具规模。

以科学的态度对两千多年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复杂的材料进行整理，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的养料，是我们深入研究《史记》的必要条件。有鉴于此，我们编纂了这本《史记研究资料萃编》，期望对《史记》研究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共分四大部分：一、司马迁研究，选录历代有关司马迁研究的重要观点；二、《史记》整体研究，选录历代有关《史记》整体研究的重要观点；三、《史记》各篇研究，选录历代有关《史记》各篇研究的重要观点；四、收录有关《史记》研究的版本、书目、文物古迹等有关资料。

由于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不可能一一收录，我们贯彻百花齐放原则，尽量多收各种观点，对于国外的研究观点也适当选录。至于对《史记》文字、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考证性观点，一般不予收录。

本书对两千多年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缺漏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年10月20日